

论对当代诗词文学地位的肯定

赖海雄

(武汉水利电力大学 学生工作处,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 中华诗词之所以能在五四之后再度繁荣, 有其民族心理积淀、汉字特征造就、社会功能使然等深层次内在原因。然而, 由于历史的误解与偏激所造成的不良影响, 当代诗词至今被拒于当代文学的大门之外。肯定当代诗词的文学地位, 是科学的文学史观的客观要求, 也是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繁荣当代诗歌创作的必然要求。

关键词: 当代诗词; 创作潮流; 文学地位

中图分类号: I207.2 **文献标识码:** A

一

中华诗词, 堪称国粹, 其源流之悠久, 卷帙之浩繁, 内涵之丰富, 形式之精妙, 举世无双, 在我国文学史上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今天, 在我们民族豪迈地走向21世纪的时候, 这一被压抑了近70年的古老的民族艺术形式, 挣脱了重负, 焕发了生机, 全国诗社林立, 诗刊无数, 作者队伍庞大, 创作成就可观, 成为当代文坛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然而, 奇怪的是, 在众多的当代文学史著作中, 在高等院校当代文学教材中, 众多的当代优秀诗人词家及其诗词作品都不被提及, 只有少数版本的文学史对毛泽东及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诗词作品作了些评述。从事当代文学批评研究的学者对当代诗词作品及其作者也是视而不见、避而不谈; 全国不少地方的诗词组织在当地的文联、作协中尚没有相应的位置; 全国各种类别的当代文学作品评奖, 当代诗词往往未被纳入其列, 凡此种种, 不一而足。总之, 当代诗词在当代文学中尚无应有之地位。

人们对当代诗词怀有偏见, 是有其历史根源的。

首先, 五四运动对旧体诗词进行了彻底否定。清末至五四运动前夕, “同光体”诗派、汉魏六朝诗派、中晚唐诗派等盘踞诗坛, 这些诗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就, 然这些诗人及部分南社诗人, 崇古复古之心太重, 躲在书斋里无病呻吟, 做些内容空虚、思想陈腐、填书塞典的作品, 把旧体诗词弄得僵化窒息、半死不活。五四文学革命者高举彻底砸烂旧文学的大旗, 胡

适、陈独秀、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等对处于文学正宗地位的旧体诗词, 从内容到形式进行了猛烈的攻击, 彻底的否定, 认为当时之旧诗“腐败极矣”(胡适《致陈独秀》, 载《新青年》第2卷第2号, 1916年, 刊时改题《就谢无量一诗对当前的文学趋向的探讨》), “尚无进古物院资格, 只合抛在垃圾桶里”(刘半农《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 载《新青年》第3卷第5号, 1917年)。与此同时, 他们提出了“三大主义”和“八不主义”, 明确宣称“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 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载《新青年》第4卷第4号, 1918年)。“新文学的语言是白话的, 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的, 是不拘格律的”^[1]。《新青年》第2卷第6号首次刊出了胡适的《白话诗八首》。在以后的几年里, 《新青年》大量刊登胡适、沈尹默、刘半农、鲁迅、周作人、俞平伯、汪静之等人的白话诗, 而《新潮》也遥相呼应, 大量发表叶绍钧、傅斯年、康白情、朱自清等人的白话诗。受此影响, 一些报刊也只发表新诗而不再发表旧体诗词。新诗的横空出世, 形成了强烈的冲击波, 把旧体诗词赶下了文学舞台。

其次, 毛泽东的谈诗的两封信对旧体诗词的生存造成了极大的不利影响。1957年1月12日, 《诗刊》创刊号欲发表毛泽东的诗词作品, 毛泽东在给臧克家等人的信中说:

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 因为是旧体, 怕谬种流传, 贻误青年; ……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 旧诗可以写一些, 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 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 又不易学。这些话仅供你们参考^[2]。

1965年7月21日他在给陈毅的信中谈到：

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但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2]。

显然，毛泽东的这些话是受了五四文学革命论的影响，它对旧体诗词的生存造成的不利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伟大领袖”的话即使是“仅供参考”也是“最高指示”，“不宜提倡”在那个年代就是“不能提倡”、“不准提倡”、“禁止提倡”。

由于上述原因，多年来，人们习惯认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唐宋之后再无诗词，况且现代汉语也不适于诗词表达。客观上说，一方面，因建国以后大学课堂少有讲授诗词写作，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一般对诗词研究比较陌生，存在着视野盲区；另一方面，对研究诗词颇有心得的从事古典诗词研究的学者，又不研究当代文学。同时，由于市场的喧闹，后现代思潮的兴起，时代文学日益大众化、快餐化，诗词因是阳春白雪的艺术而曲高和寡，批评家宁可驾轻就熟地对卫慧、棉棉们的作品大肆炒作，也不愿甘于寂寞对当代诗词认真审视。凡此种种，造成了批评家和文学史家囿于既有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史模式，一任其对当代诗词的隔膜与误解存在下去。

二

然而，植根于民族历史文化土壤的中华诗词，是不会在时代的偏见与误解中消亡的。真正的诗人从来就没有放下手中的笔，诗词创作的地下暗流从未停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有如春雷惊蛰，彩焕大地，中华民族迎来了艺术的春天。久经钳制的诗人奔走相告，雀跃欢呼，不约而同地拈毫濡墨，放声吟唱。中华诗词在新的历史时期终于以不可阻挡之势，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创作潮流，成为当代文坛最为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概而言之，建国以后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当代诗词创作现象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诗词组织星罗棋布

自1978年萧军、楼适夷、王亚平等人在北京成立了野草诗社以来，全国各地诗社、诗词学（协）会竞相成立。1987年5月31日，中华诗词学会在北京正式成立。据初步统计，全国市、县一级绝大部分成立了自己的诗社，除内蒙古、西藏以外，各省、市、自治区均成立了自己的诗词学（协）会。江西省靖安县不仅成立了县级诗社，而且各乡也都成立了诗社，有的村还成立了诗词吟唱组，被人们誉为“诗词之乡”。《人民日报》1989年11月9日报道称：“踏遍山乡路，诗朋满靖安。”位于

重庆市的国家特大型企业——建设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1987年3月成立了“建设诗社”，已有社员600人，被人们誉为“传统诗词之厂”。

（二）诗人词家浩若繁星

据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周笃文先生在《当代诗词》1998年第3期撰文介绍：“仅中华诗词学会即有个人会员7000余人，团体会员170余个。据抽样统计，各级诗词组织的成员大约在20万左右。”总之，建国以来，从事当代诗词创作的诗人词家有如繁星布空，辉满银河，并大致可分出如下几种主要类型的诗人群：

1. 勒马回缰的新文学家诗人群。建国以来的诗人词家中许多卓有成就者，恰恰是曾经提倡新文学否定旧体诗词的新文学家。郭沫若一生创作的旧诗多达1400余首，远多于其新诗。臧克家不仅公开表示“我是一个两面派，新诗旧诗我都爱”（《新诗旧诗我都爱》，载《文艺报》1962年第5、6期合刊），而且晚年更认为其“写新诗的劲头小了，而对旧体诗的兴趣越来越浓”（《自道甘苦学旧诗》，载《诗刊》1988年第4期）。周作人、郭绍虞、叶圣陶、王统照、田汉、老舍、钟敬文、冯至、何其芳，等，其后期无不勒马回缰，成为创作丰富、成就非凡的诗词家。

2. 力透纸背的学林名著诗人群。在当代诗词作者队伍中，有一大批名震学界的专家、教授，他们感怀即兴，缘事而发，作品精工典雅，格调纯正，有的成就卓著，成为一代大师。例如：陈寅恪、吴宓、周谷城、夏承焘、王力、唐圭璋、钱钟书、龙榆生、缪钺、沈祖棻等。

3. 声重骚坛的文人名士诗人群。这其中部分人是诗词复兴运动的组织者、领导者，是当代诗词改革与发展的设计者、实践者。其中如霍松林、林从龙、李汝伦、周笃文，更是成就功勋并重，饮誉中外。柳亚子、周瘦鹃、罗章龙、张伯驹、赵朴初、荒芜、熊鉴、袁第锐、刘人寿、蔡厚示、侯孝琼……无不是创作丰富、卓有成就的诗词大家。

4. 健笔凌云的政治家诗人群。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干部或其他政治家、著名爱国人士中，有不少人集政治家的胸襟气魄与诗人的气质风采于一身。毛泽东以伟大的思想抱负、丰富的斗争实践、高超的艺术素养和杰出的诗人才华，写下了不少雄视千秋、独步古今的诗词作品。江泽民同志也不时有诗词佳作问世。董必武、朱德、叶剑英、陈毅、陶铸、邓拓，及其他的政治家、著名爱国人士如沈钧儒、何香凝、于右任、章士钊，等，也为当代诗词留下了不少奇篇佳作。

5. 寄情吟咏的艺术家诗人群。艺术大师往往对诗词情有独钟，以诗词来抒写心灵、谈艺论道、唱和酬

答、美刺世事,写下了不少意境优美、感情真挚的优秀诗篇。如:刘海粟、丰子恺、潘天寿、张大千、蔡若虹、启功、沈鹏,等。

6. 风鹏正举的中青年诗人群。近年来一批批青年才俊加入了作者队伍,他们在艺术的海洋中迎风弄潮,崭露头角,构成了后浪奔腾的群体气象。星汉、杨启宇、熊盛元、马斗全、熊东遨、刘梦芙、段晓华、钱志熙、王国钦、周燕婷、魏新河,等,皆才华横溢,诗名藉甚,其中佼佼者已成就非凡,卓然成家。

(三)诗刊诗集层出不穷

据初步统计,目前,全国各地创办的诗词专门刊物有1000余家。由中华诗词学会主办的《中华诗词》在目前全国纯文学刊物读者普遍减少的情况下,订数逐年上升。《当代诗词》、《湖南诗词》、《甘肃诗词》、《陕西诗词》、《江西诗词》也各具特色,各呈异彩。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沈尹默诗词选》、《茅盾诗词集》、《俞平伯诗全编》、《胡风诗全编》等著名诗人的诗集相继问世,当代诗坛出版个人作品集和整体性的诗词选集层出不穷,方兴未艾。就个人诗集而言,仅由王国钦主编的“新纪元中华诗词艺术书库”大型丛书从1993年到1996年就出版了6辑60卷,每卷即为1个或几个作者的作品集的单行本。同时,近10年来,全国各地出版的大型当代诗词作品选集、辞典达数十种之多。

(四)诗坛活动此起彼伏

新时期诗词复苏以来,较之相对冷寂的新诗界,诗词界可谓异常活跃。首先,全国各地除经常性地举行各种诗词吟唱会、理论研讨会、创作交流会以外,全国性的中华诗词研讨会自1987年5月9日首次在岳阳召开以来,每年举行一次。其次,自1992年6月27日由中华诗词学会、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经济日报、光明日报等12个单位联合主办的首届中华诗词大赛开赛以来,全国各种诗词大赛接踵而至,此起彼伏,达几十种之多。其中影响甚大者除参赛作者达两万余人、参赛作品10万多篇的首届中华诗词大赛以外,尚有“李杜杯”、“鹿鸣杯”、“回归颂”、“世纪颂”等诗词大赛。

(五)创作成就蔚为可观

当代诗词作品出现了一大批既有古典艺术韵味而又独辟蹊径的震撼人心、足堪传世的作品。这些作品在内容上或以响遏行云的赞歌,赞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或以冷峻犀利的笔锋,鞭挞社会的丑恶现象;或深刻剖析历史进程的迂回曲折;或深入思考人心震颤的是非得失。在艺术方面,或体裁上大胆探索;或手法上新颖别致;或构思上精巧奇妙;或意境上开拓创新,或雄浑、或豪放、或深婉、或绮丽、或古简、或冲淡、或纤秣、或疏野,格高味厚、意深韵远。可以肯定地说,

当代诗词在思想上、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与现代新诗毫不逊色,其中优秀作品,令诗词在唐宋之后别有天地。霍松林先生在评价林从龙先生等主编的《当代诗词点评》时云:此书“堪与《河岳英灵集》媲美”,“入选者多佳作,可备一代诗史,足以传世行远”。大家知道,聂绀弩为继鲁迅之后的又一杂文大家,然而,聂绀弩的旧诗《散宜生诗》一出,即风行于世,以至他的文名竟为诗名所掩。的确,聂绀弩以杂文为诗,举不羁之才,抡神妙之笔,运哲人之智,披旷士之怀,揽万象纷纭,共人民忧乐,创千秋格调,铸一代诗史。其诗沉雄蕴藉、高古新奇、陋俗归雅、谐趣生庄。正因如此,聂诗注者蜂起,有人称“聂诗学”正在兴起。

三

我国是诗的国度,自人类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问世以来,《楚辞》、汉乐府、唐诗、宋词、元曲,至明清及当代诗词,在三千余年时间里,中华民族的诗歌艺术在发展演变中,逐渐形成了美的特质,并以浩如烟海的华章杰构和灿若繁星的诗词大家,铸就了无与伦比的艺术丰碑,至今深为世界其他民族所喜爱,所以朱光潜先生认为:“中国文学只有诗(指传统诗词,笔者注)还可以同西方抗衡,……它的精炼和深永却往往非西方诗所可及。”^[3]

五四文学革命者给诗词以毁灭性打击,以致柳亚子1942年在《新诗和旧诗》一文中说:“我敢大胆肯定道:五十年后,是不见得再有人写旧诗了。”然而,50年过去了,中华诗词不仅没有消亡,反呈繁荣发展之势。中华诗词之所以能起死回生,自有其深层的内在原因,概要如下。

(一)民族心理积淀

任何一种有强大生命力的艺术形式都以其特有的审美范式与其民族心理契合。格律诗词暗接中华民族的深层心理,体现中华民族艺术的本质属性。诗词的声律结构就较好地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的和谐精神。律诗的平仄安排遵循三大规律:相间律、相对律、相粘律。相间律,即是一句之内,每两个相邻音步的节奏点上的字,平声和仄声相间,交错使用;相对律,即是一联之内(除首句入韵的尾字外),上下句在相应的节奏点上的字,平仄相对。律诗的这种二元对立音律组合结构,营造了一种相间相续、口吻调剂的音律和谐效果,体现了异音相从、以他平他并在转化生成的动态过程中获得和谐统一的中国古代的对立和谐观。相粘律,即是指相邻两联之内(除尾字外),上联的对句与下联的出句相应节奏点上的字平仄相同。有了这局部的粘

合呼应,律诗的声律结构才避免了单调重复而变得丰富,律句获得了两两相粘相对,井然有序的生动气象和整体和谐的效果,体现了不仅讲究局部和谐,更追求在更高层次上交流互渗、对立统一的中国古代的整体和谐观。同时,因为这种相粘律,使得律诗依次每相邻四句组成了一个首尾相粘,闭合无间的“圆”。这也正体现了四节律动、周流旋回的中国古代的天地宇宙间的循环大和谐观。正因为中华诗词存在着与民族心理谐振的契合点,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使得诗词融化在民族的血液里,渗透到医学典籍、传统剧本、佛道经典、小说话本、哲学著作、书法绘画等一切中华民族的高雅文化艺术中,成为中华民族文化重要的基石和母体。

(二)汉字特征造就

方块汉字,具有其他民族语言文字所不具有的文化特质。正是汉字的这种文化特质,造就了中华诗词这一精美绝伦的艺术形式。其一,汉字方方正正,用以写作诗词给人以富丽堂皇的建筑美。其二,汉字每字的读音都可据其发音的高低、升降、长短分为四声,归为平仄两类(不同于西方诗论中所谓的“诗的非节奏的成分”),诗词中平仄律(也有别于西诗的轻重律)的运用造成了诗词音调抑扬顿挫的和谐美。其三,汉字一字一音,诗句中音节固定,形成了顿、逗(一句之中最显著的顿),符合人们诵读吟哦时的自然生理与心理要求,使诗词富于节奏感和旋律美。其四,汉字的音韵特征,为诗词的押韵提供了方便。诗词在吟咏诵读时“句”的独立性很强(不像西诗句的关联性很强而行末可不停顿),句末用韵就可以前呼后应,使诗词富有音韵美。其五,汉字因言成象和立象尽言的表意特征和造境艺术,造就了诗词特有的意境美。其六,汉字音、形、义三位一体,意象成双成对,而读音也可两两对应,为对仗提供了可能,这使律诗表达更加精蕴缜密,雄浑严整,具有西诗因西文单音复音字相错杂所不具备的对称美。其七,汉字造句极富弹性,可使诗句自由伸缩颠倒,甚至可浓缩精炼到直接将意象缀合成句,避免了呆板的西诗句式的繁枝芜叶,增强了诗句的凝炼美。总之,汉字与诗词天造地设般紧密联系在一起,诗词因汉字而完美,汉字因诗词而辉煌,只要汉字一天不灭,诗词也会一天不亡。正如郁达夫所言:“到将来,只教中国的文字不改变,我想着着洋装,喝着白兰地的摩登少年,也必定哼哼唧唧地唱些五个字或七个字的诗句来消遣。”^[4]

(三)社会功能使然

孔子在《论语·阳货》中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毛诗序》中云:“正得失,动天地,感鬼

神,莫近于诗。”自《诗经》开始,我国历代优秀诗人自觉坚持反映时代生活的现实主义创作路线,或感时伤乱,忧国忧民;或抨击时弊,碧血丹心;为时为事,增善消恶,留下了无数流传千古而不衰,吟诵万代而愈厚的光照古今的优秀诗篇。3 000 多年的中华诗史,真实地记录了中华民族的政治风云、历史演变、社会生活和人民的情感心志,对推动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3 000 年来,中华儿女不仅用诗词来言志抒情,更用它来作为战斗武器。1976 年在诗词被赶下历史舞台近 60 年后,人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诗词这种民族文学形式,将心中压抑愤懑之情以排山倒海之势迸发出来,并作为刺向妖魔鬼怪的投枪匕首。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天安门诗抄》中,新诗只有 59 篇,而诗词及仿诗词则达 417 首,这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天安门诗歌运动,再一次以不可否认的事实雄辩地说明,诗词至今仍具有深厚的民族土壤、广泛的群众基础、巨大的社会作用和顽强的生命活力。

总之,凝结于诗词作品之中的慷慨豪迈的精神气象,赤诚报国的诗性精神,含蓄婉曲的格调意蕴,风情摇曳的艺术美感,无不与我们的民族精神、语言文字、抒情方式、审美趣味、心理定势相通相合,融为一体。正是基于以上原因,可以肯定地说,中华诗词是永远打不倒的,其存在与发展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即使像鲁迅、闻一多这样对旧文学横扫千军如落叶的新文学主将,骨子里对诗词仍是深深的迷恋。鲁迅尽管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可是未及转身,他接下来又说:“然而言行不能一致,有时也谄几句,自省殊亦可笑。”^[5]闻一多曾在《敬告落伍的诗家》中对讲平仄的诗人冷嘲热讽,他甚至认为写旧体诗是“背叛民族”,可他终于还是作诗宣称:“六载观摩傍九夷,吟成缺舌总猜疑。唐贤读破三千纸,勒马回缰作旧诗。”他们及众多的新文学家,对旧体诗词从抨击、否定到认同、回归的转变,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四

一个时代的文学史应该是这个时代一切文学现象有机的历史整合。文学史家及文学研究者对某一时代的文学现象及作家、作品,完全可以用科学的眼光和求实的态度进行评判、取舍,但不应该随意切割抛弃活生生的文学现实,对既存的文学现象漠然视之,嗤之以鼻,否则,所写出的文学史是存在明显缺失的。同时,我们还应该明确下列几点:

其一,格律不是束缚,而是艺术美的表现形式。格

律是诗词的精髓与特色,诗词有格律,一如跳舞有舞步。每种艺术都有自己的法则,有约束才能有更大的自由,有限制才能更好地显出身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安德烈·莫洛亚在《论格律诗》中说:“约束拯救了艺术家。”

其二,一个民族对其优秀传统文化只宜继承弘扬,不应抛弃否定。中华诗词是因格律而将汉语的声情意象之美推到极致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精华,是堂堂正正的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没有自己的诗歌,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化,这个民族无法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而有自己光辉灿烂的诗歌,有自己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而不知道珍惜和弘扬,这个民族也会迅速衰亡。我们只有珍视中华诗词这一宝贵文化遗产,继承弘扬,合理利用,在与世界文化的交流、碰撞中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中华民族才能很好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其三,五四对传统诗词的冲击是历史的偏激。五四先驱者的历史功绩自不待言,但他们也存在历史的局限,没有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来看待问题,且有一种不容讨论不许争辩的悍气,他们对民族历史缺乏应有的自信,对外国思想缺少必要的批判,表现出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一味背弃和对西方思想文化的极力亲合。这种情绪化的偏激与盲目性的狂热,所造成的恶果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否定传统诗词一如他们中的某些人主张废弃汉字、否定中国两千年的文学一样是一定程度上民族虚无主义的表现。

其四,“旧瓶”可以装“新酒”,旧体诗与新体诗可以并行不悖。当代诗词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对旧体诗词进行了一定的革新,中华诗词学会为当代诗词提出的“适应时代,深入生活,走向大众”的创作原则,为当代诗词创作指明了方向。实践证明,尽管汉语言发生了变化,但是当前利用诗词的形式一样能够写出可与唐宋诗词相媲美而又富有时代特色的传世之作。形式不在乎新旧,内容才是关键,旧瓶可以装新酒,新瓶也可能装的是旧酒。五四以后新诗在诗坛取得了主导地位,但是新诗兴起并不意味着旧诗该亡。律诗的出现并没有排斥古风,词的产生也并没有消灭律诗、古风,曲的问世同样并没有废除词、律诗和古风。旧体诗与新体诗完全可以互相借鉴,互相促进,双峰对峙,并存共荣,郭沫若在《谈诗歌问题》中说得好:“好的旧诗万岁,好的新诗也万岁!”

近些年来,一些社会名流、专家学者以他们的远见

卓识不断发出呼吁,吁请社会应该高度重视当代诗词的发展,充分肯定当代诗词的文学地位。孙轶青、范静宜、傅璇琮等六位全国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八届二次会议上专门就振兴传统诗词问题作了联合发言;倪墨炎则在1985年《书林》第5期上发出呼吁:“应当重视旧体诗词在现代诗歌中的地位”;钱理群在1998年第1期《安顺师专学报》上发表文章《一个有待开拓的领域——〈二十世纪诗词选〉序》,指出应该“关注与思考旧体诗词在本世纪的命运”,并加以“研究”与“认同”;公木在1998年11月19日《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当代诗词的变革之路——〈当代诗词学〉读后》,指出:当代诗词的繁荣发展之势“实在是研究古典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学者都必须认真钻研的一项重大课题!”并对“许多现代文学的研究者偏偏莫名其妙地将这些同样富于现代性的旧体诗词逐出了文学史”而大惑不解;舒芜在1998年11月28日《文汇读书周报》发表文章《另有一个诗坛上》,介绍当代青年诗人的诗词作品,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并认为应重写文学史,充分肯定当代诗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凡此等等。其真知灼见,深中肯綮。

既然当代诗词创作已成为席卷全国的势不可挡的创作潮流,既然当代诗词创作已取得了不可否认的成就,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对其视而不见,避而不谈呢?既然我们对通俗文学、新派武侠小说都给予了肯定,既然我们对京剧、书法、国画等民族文化都给予了礼遇,我们为什么独独对民族文化的精华在当代延伸的当代诗词不能平心静气地对待呢?当代诗词的确是矿藏丰富的“一个有待开拓的领域”,期待着更多的专家学者摒弃偏见,消除误解,精心开采,认真研究,作出科学的评价,给予充分的肯定。

参考文献:

- [1] 胡适. 胡适思想小品[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7.
- [2] 臧克家. 毛泽东诗词鉴赏[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0.
- [3] 朱光潜. 诗论[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7.
- [4] 郁达夫. 郁达夫诗全编[M].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0.
- [5] 鲁迅. 鲁迅全集(第12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责任编辑 于华东)